

# 中國版反恐借兩會之力上路

文 扬

3.1 昆明恐襲案注定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如一些評論所說,歷史給這個事件的定位將會類似于美國的 9.11,因為從這個事件開始,“中國版反恐”走上了自己獨特的反恐之路。

首先一點,當然是發生的地點和暴烈的程度。既然能發生在昆明,能發生在火車站,能一次造成三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傷,今後任何形式和任何規模的恐襲就都有可能。這就意味着,對中國來說,恐襲再也不是遙遠地區的偶發事件,這一次,狼真的來了。

第二點,是發生的時機。由於正值中國兩會召開之前,這一恐怖事件從全國關注通過兩會直接上昇到全國表態乃至全國決策,輿論熱點迅即轉成為工作重點。“要標本兼治,多管齊下,綜合施策,但根本還在爭取民心,”張春賢書記在兩會的發言中,已經给出了思路。

第三點,是西方的態度。西方的第一反應,一如既往,不承認這次暴力襲擊是恐怖主義行徑,西方各大主流媒體使用了各種變通修辭,就是避用恐怖襲擊這個概念。雖然後來又勉強承認,但其基本態度已經非常明朗:中國政府的反恐,不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反恐大局之內,中國所定義的恐怖主義,不被西方所接受。

上述三點結合起來,客觀上已經宣告了中國版反恐的誕生。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認清中國版反恐與西方版反恐的相同之處和差異所在,穩步走上中國自己的反恐之路,並避開西方版反恐越反越恐的陷阱。這是事關中國反恐大業成敗的大事。

## 西方版反恐的本質是捍衛既定秩序

和其他主義相比,恐怖主義看起來語焉不詳,定義含混,其實這是假象。在西方政治家心目中,這個概念一直有着精確的標準,並不隨便亂用。雖說任何引發公眾恐慌的暴力事件都可稱之為恐怖事件,但凡有某一類帶有明確政治意識形態的事件,才被承認是恐怖主義行徑,範圍很窄。

正如英國《衛報》的一篇文章所說,“一件事是否屬於‘恐怖主義’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並會引起顯著的法律後果。這個詞,從某一角度來說,是我們最強有力的政治詞彙。它可以一手結束所有辯論,將恐懼的程度拉到最頂端,並讓政府在此名義下為所欲為。”

說到底,在西方眼里,真正的恐怖主義,就是帶有顛覆當前全球秩序這一明確的政治意識

形態的暴力行爲,由於全球秩序是由西方所確立並主導的,因此顛覆這一秩序也就是挑戰西方領導地位。

換句話說,恐怖主義的內部定義其實是顛覆主義或造反主義,而全球反恐的背後意識形態其實是秩序主義或鎮壓主義。由於全球等級秩序和西方領導權這個事不便明說,畢竟聯合國憲章中白紙黑字寫着各國一律平等、尊重民族自決,所以只好用恐怖主義這麼一個半通不通的名詞代替各種旨在顛覆秩序的暴力抗爭,同時用反恐代替各種旨在捍衛秩序的暴力措施,使用者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

於是,西方聯軍的先發制人軍事打擊,無論造成多大的恐怖、濫殺了多少平民,都不是恐怖襲擊;而只要是明確針對西方全球統治、帶有顛覆性的暴力活動,無論規模大小,恐怖與否,都是恐怖主義行徑。所以,恐怖襲擊其實並不靠恐怖程度衡量,也不以平民的死傷為標準,確切說,與伊斯蘭教本身也沒有必然關係。之所以一些典型的恐怖襲擊事件帶有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文明衝突”的表象,無非是因為堅持秩序主義的西方正好都是基督教國家,而堅持顛覆主義的勢力又恰好在伊斯蘭國家中表現得比較突出。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西方在面對發生在中國的恐怖襲擊時會採用雙重標準。不用說,中國並不是西方統治聯盟中的一員,恰恰相反,中國的崛起實際上構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甚至是更大的顛覆,從根本上講也是在動搖當前的全球秩序,也是在挑戰西方的領導地位。所以,按西方對於恐怖主義的內部標準,所有針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性暴力襲擊事件,不僅不是恐怖襲擊,反而為西方所樂見,因為這些襲擊起到了削弱中國力量、妨礙中國崛起的作用,客觀上也就輔助了西方的秩序主義,相當於是一種“好的”恐怖主義。

既然另有一套關於“好的”恐怖主義的認定,當然也就有了雙重標準,自六年前 3.14 直到最近的 3.1,在所有這些發生在中國的事件中,西方無一例外都是雙重標準。其實很正常,一旦看穿了西方版反恐的本質,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

處在西方雙重標準之下的中國版反恐

就這樣,由於中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中國版反恐的特殊性。

對源自新疆的恐怖主義來說,無論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如何,中國的國家行爲即已構成了全球秩序的一部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是世界“麥當勞化”的一部分,甚至很多方面有過之無不及,中國政府在維穩和打擊極端勢力方面與西方的做法也並無不同。所以,其他方面暫且不論,如歷史上中原與西域、漢族與維族的關係等,僅憑中國自身的秩序主義立場,就已經成為了恐怖主義分子心目中的顛覆對象,就是打擊目標,沒得商量。

從這個方面看,中國版恐襲與反恐這一對立,與西方版有相通之處,本質上都是圍繞着秩序的維護與顛覆。只要既定秩序中包含着中心與邊緣、上層與下層、先發與後發這種資本主義世界的內在結構,那么秩序與反秩序、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就不會停止,一旦表現為暴力衝突,在秩序主義者眼中,就是恐怖主義。

但正如前面所說的,中國政府在國內所實行的秩序主義,卻又不能完全被西方全球範圍的秩序主義所承認。因為國內的秩序主義實行得越好,意味着中國的崛起速度越快、力量增長越快,也就意味着對西方全球秩序的顛覆性越大,挑戰性越大。

西方戰略家並不傻:幫助中國反恐,就等於幫助中國建立秩序,在西方秩序搖搖欲墜的今天,這也就等於幫助中國顛覆西方,這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在他們看來,中國左右逢源佔盡了便宜,當年公開顛覆西方秩序,號召世界革命,關於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毛主義”至今還被世界各地的激進勢力當做法寶;後來你又轉為迎合西方秩序,全面接軌世界資本主義,並藉助這一秩序提供的和平穩定贏得了發展機遇,賺足了“秩序紅利”;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你也遭遇了反秩序主義的恐怖襲擊,借用一下阿慶嫂之問:您老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啊?中國版反恐將“被獨立自主”

西方戰略家沒錯,中國靠紅色革命建國,至今仍是紅色的人民國家,天生帶有顛覆主義本

質,在基于秩序主義意識形態的反恐合作上,不可能與西方完全合拍。這一次昆明恐襲,若不是襲擊者公然濫殺平民,帶有中東地區恐怖襲擊的典型特徵,西方是斷不肯承認其恐怖襲擊性質的。

西方不肯為中國版反恐正名,中國當然不能強求。況且,西方版反恐天生帶有反人民的性質,甚至帶有文明衝突乃至宗教戰爭的底色,中國也不可能與之合流。自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來,中國實際上一直持批評態度,也斷言這種形式的反恐沒有出路,只能越反越恐。中國的這種立場當然根據十足,“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必勝”、“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都是紅色中國的經典理論,而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恰恰就是這些顛覆主義理論的成功實踐。

既然深諳秩序主義與顛覆主義之間永恆鬥爭的規律,深信西方版反恐越反越恐沒有出路,中國版反恐若再重複西方的老路,就成了知錯犯錯,全無道理。

如此看來,西方將中國版反恐拒之門外並非壞事,中國版反恐雖是“被獨立自主”,卻也必然要獨立自主,畢竟人民國家不可能施行反人民的反恐,多民族的國家不可能施行製造民族仇恨的反恐,多宗教的國家不可能施行激化宗教對立的反恐,歷史型的國家不可能施行割斷歷史聯繫的反恐。

這些特殊性,共同決定了中國版反恐必須走出自己獨立自主的反恐之路。但到目前為止,路在何方,前景如何,還不很明朗。昆明恐襲案發生後,輿論嘩然,各種說法湧現,很多建議着眼于改善新疆維族人生活處境,提高維族人社會地位,甚至於回味起新疆過去的田園牧歌、宗教情感,這種物質主義的或復古主義的思路雖無大錯,但終歸是沒有認識到當今世界秩序主義與顛覆主義之間的深刻矛盾。

環顧世界,沒有哪個地區還靠保留田園牧歌維持着和平穩定,也沒有哪個民族只滿足于接受物質收買。西方秩序主義幾百年了,從暴力到金錢,從宗教到文化,各種統治手段都試用過,其中包含的所有歷史經驗,也都值得中國借鑒。中國版反恐能否避開越反越恐的陷阱,走上一條成功的反恐之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正反歷史經驗的借鑒。希望在兩會上看到更多的好思路。**2014 年 3 月 6 日**

# 鄭永年:21 世紀的政治秩序危機

美籍日裔作家福山在 1989 年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中心觀點很簡單,即西方式自由民主是人類歷史的最終政體形式。蘇東共產主義解體讓福山的觀點不僅在西方聲名大噪,被視為經典,也很快傳播到那些仍然是非民主的社會。

但站在今天的世界,不知道作者會如何看待民主政體:誠然,那些還沒有成為民主的社會,人們仍然努力爭取民主,歷史似乎依着“歷史的終結”的道路前行。不過今天所看到的民主政治秩序,已經很難是“歷史的終結”。在非民主社會,民主化的確在摧毀着原來的各種政體,但民主化也同樣在摧毀着原來建立起來的民主秩序。民主可以摧毀原來的秩序,但很難建立起一個新的秩序。在 21 世紀的世界,我們注定要面臨一場深刻的政治秩序危機。

在泰國,政黨之間的惡斗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不管誰成為反對黨,都能動員到足夠的政治力量,推翻現在的執政黨政權。反對黨要求政治改革,以冠冕堂皇的口號動員甚至挾持社會力量,但執政後都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改革。現在甚至發展到抵制選舉的地步。沒有政府,誰來進行政治改革?反對黨會說,人民、但誰是人民呢?人們所看到的是各種利益不同的社會群體,但找不到政治人物口中的“人民”。

印度的例子更為典型。從人口規模來說,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英國殖民結束後,印度的民主運作得相當不錯,儘管各種社會衝突一直存在。但現在則出現新形式的街頭運動。日前,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示威者佔領了市中心,癱瘓了交通,發起者便是新任行政首長基杰里沃夫(Arvind Kejriwal)。因為直屬於聯邦政府管轄的內政部,拒絕將四名涉嫌失職的德里警察停職。基杰里沃夫因此發動示威,試圖迫中央政府就範,交出首都的警察權。由當政者搞街頭運動比較新鮮,但其支持者認為,印度所謂的民主政治的腐敗已經根深蒂固,需要用非常的手段才能破舊立新。

在烏克蘭,因為政府暫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引發了政治危機,反對派要求現政府下台,執政黨當然不肯。為了“妥協”,政府提出讓反對黨“權力分享”的計劃,但反對黨不接受。暴力還在進行,人們仍然不知道如何終止這場危機。

不僅新興民主社會如此,西方發達民主社會也經常如此。街頭政治成為這些民主政治的共通點。首先,所有街頭政治表面上都表現為“人民”對抗“政府”,具有吸引人的政治口號,也就是抗議者所提出的“理想社會”,抗議者(及其口號)能夠動員很大一部分社會群體參加。其次,抗議者都會強調運動的“和平”性質,但在過程之中往往出現暴力。再次,受各種內外環境的制約,執政黨很難簡單地使用暴力

機器來控制街頭運動的暴力化,使得國家和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

## 精英群體之間鬥爭

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矛盾當然普遍存在着,但不是街頭運動的唯一原因。除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矛盾,街頭運動還具有更深刻的精英群體之間的矛盾。

首先,街頭政治是不同政黨之間爭斗的結果,政黨是由精英組織起來的,普通民衆只是被各政黨動員的對象。儘管民衆的參與構成了街頭運動,但獲益的則是少數政治精英。

其次,街頭運動往往表現在中央精英與地方精英之間的矛盾,印度的例子便是這樣。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中央集權是現代所有政治體制的特徵。但中央集權不見得能夠提供有效治理,而且也經常遏制地方(一線政府)的創新。日本社會也呈現出這樣的現象,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挑戰中央,在中央政府找不到改革出路的情況下,尋求地方的突破。北美、歐洲等地也都存在類似的爭斗。

再次,街頭政治也表現為新型與舊型精英之間的矛盾。不同社會階層的精英之間,矛盾一直存在,但現代社會經濟形式變化迅速,導致社會階層的快速變化。當現存體制不能及時調整,來體現新興社會階層利益的時候,新興利益經常訴諸于街頭運動。

人類的社會政治秩序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從傳統社會地方化了的政治秩序,到神權政治,到帝國,到基于主權國家概念之上的君主貴族,精英民主,再到現代大衆民主。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秩序,是英國產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的產物。產業革命導致經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財富被創造出來,繼而導致大衆教育水平的提高。法國革命則創造了“人民主權”的概念,政治平等、社會公正等成為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追求這些權利也構成了近代以來民主化運動的主軸。

實際上,民主政治秩序並非是各種革命所創造的抽象概念的產物。英國自由主義先驅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維坦》中,把秩序視為比任何其它東西都重要,沒有秩序就沒有社會。秩序是自由的前提。在西方,國家基本制度都是在高度集權的君主貴族統治時期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體制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資產階級成長的制度環境。資產階級成長起來之後,君主貴族政治轉型,用代議制的形式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各種調和階級利益的機制也被創造出來。因此,馬克思把近代民主視為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其後,民主能夠與時俱進,最後實現了“一人一票”的大衆民主。

從理論上說,大衆民主似乎實現了法國革命

的政治平等目標。在操作層面,不管是怎樣的民主形式,人民永遠都成不了自己的“主權者”,人民只是獲得了選舉領導人的權利,很難自己行使統治權,人民的權利只是選舉出自己的統治者。哈佛教授熊彼特因此把民主定義為“精英之間的競爭”,精英之間的競爭为人民提供了實現各種政治權利的機會,包括言論自由、政治參與等。只有到了社交媒體時代,這種情况才出現巨大的變化。

如果說民主是精英之間的競爭,精英共識可以說是民主的前提條件。精英之間有共識(共同的道德準則和水平、共同的意識形態、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等),民主便可運作起來。一旦精英共識消失,民主便會死亡。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民主在發展中國家的情况更為糟糕。上世紀 60 年代,另一哈佛教授亨廷頓著《變革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的主題,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秩序。秩序至為重要,但要建立秩序則不易。西方社會的議會政治到了非西方社會,往往演變成街頭政治和暴力。在發展中社會,各種條件例如缺乏階級、階層的妥協機制、沒有精英共識等等,經常造成無政府狀態(這一點本欄已有專門討論)。

即使是在發達民主國家,大衆民主的生存和發展也開始面臨着史無前例的挑戰。在所有民主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之間的不對稱已經造成了“弱政府”、精英共識的消失、政府和社會的對立,對民主的生存和發展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 當代民主面臨威脅和挑戰

當代民主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首先來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沒有政府可以宣稱自己擁有經濟主權,所有的經濟要素都在全球範圍內快速流動。同時,各國的政治主權則越來越強化,“一人一票”體制下,政府由人民所產生。前者意味着政府必須“親商”,否則資本流失,稅基就會越來越小;後者意味着政府必須“親民”,“一人一票”下,社會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兩者處於極端的矛盾之中。

其次是現代產業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挑戰。現代產業,無論是金融業還是信息產業,都傾向于產生一個極小的富裕階層和一個極大的窮人階層。傳統產業所塑造的龐大中產階級,在現代社會沒有了經濟基礎;基于中產階級之上的傳統大衆民主,也失去了其往日的社會經濟基礎。因為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平等,掌握大量財富的極少數人,必然通過各種途徑來影響政治過程,結果造成一些學者所說的“一元一票”。一個國

家的窮人越多,錢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就越大。

再次,與全球化緊密相關的社會高度流動性,也構成了對大衆民主的挑戰。無論是高端人才,還是低技能勞工都在各國之間流動,閉關守國意味着死亡。但社會流動也產生了很多問題,最顯著的就是“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矛盾。民主意味着“本地人”,但全球化則意味着“外地人”。歐洲、亞洲都是這樣。這在移民國家表現得尤其顯著。這些國家大量的外來人口,在經濟上貢獻顯著,但不能享受政治權力。

對大衆民主構成威脅的,也來自正在促成真正大衆社會來臨的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時代,人人都可以製造和設定政治議題。人人都可以成為政治家,甚至革命家,可以動員相當大的社會支持力量,對現政權構成巨大的壓力。在大衆民主時代,民主已經演變成人民的世俗宗教,人們都相信,通過民主可以爭取到自己所想得到的東西。法國大革命以來,權利“人生而有之”已經成為普世的信念,但只有到了社交媒體時代,人們才有了爭取權利的條件,爭取權利的“權利”,掌握在每一個人的手里。

一人一票、社交媒體等都在改變着傳統的精英民主局面,而接近實現真正的大衆民主。民主的運作要求“一人”貢獻“一份”(經濟)。如果說,人性的光輝(追求自我實現的理想)決定了“一人一票”不可避免,人性的弱點(不變的自私本質)決定了“一人”貢獻“一份”的不可能。只要存在着任何可能性,人們便會追求實現“政治權利”,而不會做經濟貢獻,用政治權利來挾持政府,得到經濟利益。這樣便出現政治權利和經濟貢獻之間的結構不對稱。這個不對稱便是西方民主危機的核心根源。

這種不對稱也必然導致弱政府。民主意味着“民意”,民意意味着“精英共識”不再重要,意味着“精英共識”的消失。一旦失去“精英共識”,便是傳統民主形式的死亡。德國思想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的職業政治家群體越來越不相關,錢(富翁)和選票(也是錢)變得至為重要。

21 世紀有關民主政治,人們需要回答一些根本性問題:越來越多的新因素在解體着傳統民主秩序,如何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呢?這種秩序有沒有可能:是怎樣的形式呢?又由誰來建立呢?人類社會一直處于秩序和失序的循環中。新秩序出現的前提就是無秩序。只有到了人們無法承受無政府狀態的時候,才會出現權威,才有可能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今天經歷着的民主秩序危機,是否也意味着一種新政治秩序的來臨呢?這種新秩序會不會繼續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會是怎樣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會是怎樣的秩序呢?